

李大钊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肇始

徐 行

(南开大学 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天津 300350)

摘要: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肇始有着不可磨灭的卓越贡献。他不但是中国最早系统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着独特的理论贡献,而且最早用马克思主义分析解决中国问题,努力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最早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反帝反封建革命,最早建立了马克思主义团体和组织。他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肇始发挥了开创性、奠基性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李大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工人运动;共产主义组织

中图分类号:B2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349X(2020)02-0036-07

DOI:10.16160/j.cnki.tsxyxb.2020.02.004

Li Dazhao and the Commencement of Marxist Sinicization

XU Xing

(Zhou Enlai School of Government,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350, China)

Abstract: Li Dazhao made a remarkable contribution to the commencement of Marxist sinicization both theoretically and practically. He was the forerunner to study and publicize Marxism, and made his special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 Additionally, he was the earliest one to analyze and solve China's problems with Marxism, to direct Anti-Imperialism and Anti-Feudalism revolution by combining Marxism and labour movements in China, and to establish the Marxist groups and organizations. Li Dazhao played a pioneering and fundamental role in the commencement of Marxist spreading and its localization in China.

Key Words: Li Dazhao; Marxist Sinicization; labour movement; Communist organization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相结合,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强大的思想武器去分析中国社会、解决中国实际问题。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李大钊发挥了开创性、奠基性的重要作用。五四运动时期,李大钊的伟大功绩不仅仅在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也不仅仅是对中国掀起马克思主义传播高潮作出了重要贡献,更重要的是他试图以马克思主义分析

和解决中国社会问题;他开始深入工人中努力将这一强大的思想武器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他开始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的反帝反封建革命,组建了马克思主义学术团体,并领导建立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在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基础上,终于诞生了中国新型政党——中国共产党,迈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第一步。

本文将研究和阐明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中

作者简介:徐行(1960—),男,天津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当代中国政治、中共党史、党建理论研究。

国化肇始的特殊贡献,并考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初发展轨迹。

一、最早试图以马克思主义分析和解决中国问题

从十月革命后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肇始阶段。李大钊是中国最早系统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沿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初发展轨迹仔细考察,就会发现,以李大钊为代表的一代先进的中国人是从激进的民主主义爱国分子逐渐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和接受很大程度上基于一腔爱国热情和受十月革命的影响。

李大钊在由一个激进民主主义者向社会主义者转变过程中,日本早期社会主义思潮对他的思想变化起了重要作用。他在东京早稻田大学学习期间,一边积极参加学生爱国活动,一边开始接触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著作。在早稻田大学李大钊学的是政治经济学科,安部矶雄教授给李大钊所在的班讲授“都市问题”选修课,其以社会主义立场讲授经济学,虽然掺杂了一些基督教的内容,但对李大钊初步接受社会主义的经济学说有启蒙作用。李大钊在日期间还阅读了日本早期工人运动领导人幸德秋水的一些著作,直至回国后,日本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河上肇及日本共产党的一些创始人仍对李大钊有很深的影响。

然而,对李大钊思想变化影响最大的是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1918年7月,李大钊发表了第一篇宣传十月革命的文章《法俄革命之比较观》^①,最早指出了俄国十月革命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是两种性质不同的革命。此后一年他又连续发表了《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和《新纪元》等文章。他把俄国十月革命同中国问题联系起来思考,开始用新的世界观分

析中国的命运。在颂扬了十月革命“这个新纪元是世界革命的新纪元,是人类觉醒的新纪元”后,他指出:“我们在这黑暗的中国,死寂的北京,也仿佛分得那光的一线,好比在沉沉深夜中得一个小小的明星,照见新人生的道路……。”^{[1]377}

李大钊的文章,除了对十月革命本身的传播外,还拉开了以新的思想看待和分析中国问题的序幕。他阐明十月革命的胜利,是“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他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1]367}李大钊的这几篇文章虽然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表述还不全面,但总的倾向已与以往不同,其所向往的已是社会主义了。它们不仅标志着李大钊系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开端,也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初萌芽和肇始。

最初介绍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刊物只有《新青年》,为了扩大宣传阵地,1918年12月李大钊和陈独秀创办了《每周评论》,该刊采取四开小型报纸的形式,每周出版一期,每期皆刊登国内外大事和社论。李大钊常用“常”或“守常”等笔名发文,在该刊物和《新青年》发表了多篇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发表在《新青年》第6卷第5号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②。该文不仅系统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而且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了中国社会的主要问题。在阐述唯物史观时,他直接引用了《哲学的贫困》《〈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和《共产党宣言》中的重要段落,这是他从日文转译的。此后,李大钊在与胡适就改造中国问题进行争论时,写了《再论问题与主义》等文章,再次阐明解决中国社会问题不能采用胡适那种就事论事、一点一滴改良的办法,只能用马克思主义这一新的思想武器来指

① 该文发表在《言治》季刊第3册上。

② 1919年5月,李大钊将他主编的《新青年》第6卷第5号编成“马克思主义专号”(该号标明出版日期是1919年5月,实际上拖至9月才与读者见面)。为了阐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容,李大钊自己写了长篇论《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连续刊登在第6卷第5号、第6号上。

导,谋求彻底解决。

在《新青年》各位编委和主要撰稿人中,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贡献最大的无疑是李大钊,他在该刊上发表了多篇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宏论。他的理论文章和实践活动对一代新型知识分子转变为共产主义者产生了深远影响。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始阶段,李大钊仅在《新青年》上发表的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文章就有:《Bolshevism 的胜利》《庶民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五一”May Day 运动史》《唯物史观在现代历史学上的价值》《俄罗斯革命的过去和现在》《平民政治与工人政治》,等等。

五四时期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以及用马克思主义分析和解决中国问题,其理论上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首先,揭露了帝国主义的本质,特别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阴谋,阐述了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他指出:“日本要想在世界上对于中国占特殊地位,也必要步德国的后尘。”日本的大亚细亚主义,“不是亚细亚的民主主义,是日本的军国主义;不是适应世界组织的组织,乃是破坏世界组织的一个种子”^{[1]379-380}。他热情歌颂了十月革命是“世界革命的新纪元,是人类觉醒的新纪元”。“他们是奉德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家马客士(Marx)为宗主的;他们的目的,在把现在为社会主义的障碍的国家界限打破,把资本家独占利益的生产制度打破。”^{[1]364}

其次,较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观和剩余价值理论,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基本原理作了简要的概述。他认为:从前的历史观“只能看出一部分的真理而未能窥其全体”,而马克思“唯物史观所取的办法,则全不同。他们目的,是为得到全部的真实,其及于人类精神的影响”^{[2]278}。李大钊还阐述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剥削实质的剖析:“余值既全为资本家的掠夺品”,资本主义制度为自己准备了掘墓人,“资本主义是这样发长的,也是这样灭亡的”^{[2]39},灭亡资本主义的就是无产阶级。

再次,李大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论述了中国革命的步骤、手段、动力等一些基本问题。他认为:“社会主义的实现,必须经过三阶段:一、政权的夺取;二、生产及交换机关的社会化;三、生产分配及一般执行事务的组织。”^[3] 这些观点,虽然与中国共产党后来提出的中国革命应该分为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前者是后者的必要准备,后者是前者的必然趋势的思想不尽相同,但在当时情况下,能够提出革命分步骤、分阶段的进行,其思想总趋向是正确的,更难能可贵的是在中国第一批共产主义者中他也是第一个提出这个问题的。

最后,号召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他指出:“要想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到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1]422} “知识阶级的意义,就是一部分忠于民众作民众运动的先驱者”,知识分子“要始终听民众的指挥,为民众效命”^{[2]221}。他认为青年知识分子不应空谈理论,应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灌输到工人、农民中去,去从事实际的民众运动。他特别强调了农民问题的重要性,指出:“我们中国是一个农国,大多数的劳工阶级就是那些农民。他们若是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他们的苦痛,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苦痛;他们的愚暗,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愚暗;他们生活的利病,就是我们政治全体的利病。”^{[1]422-423} 李大钊这些精辟的论述,指导了进步青年把学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工农运动相结合。

二、最早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

马克思主义要实现中国化,除了在民众中广泛传播外,更重要的是将它与工人运动相结合。李大钊不但在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方面发挥了奠基性作用,而且在中国近代史上最早把马克思主义传播和运用到工人运动之中。

五四时期,工人阶级的壮大也使马克思主义传播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备了一定的阶级基础。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产阶级力量有

所增长,工人阶级也日益壮大,由辛亥革命前的60万人发展到五四运动时的200万人左右。工人阶级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形成包括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反帝反封建统一战线。中国政治舞台上出现了新的阶级力量,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迫切需要寻找科学的精神武器,而马克思主义正是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强大思想武器。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新文化运动便逐渐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运动,在这一运动中,以李大钊为代表的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觉悟的知识分子,逐步完成了由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在李大钊等人的积极努力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以广泛的传播,并促使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肇始时期。

为了引导青年把马克思主义传向工农大众中去。1920年8月16日,李大钊来到北京陶然亭,对在这里集会的北京少年中国学会、青年工读互助团、人道社、曙光社、天津觉悟社几个进步团体的青年人发表了演说,他特别强调了主义的重要性,指出“主义不明,对内既不足以齐一全体之心志,对外又不足与人为联合之行动”^[4]。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最初只是在知识界的范围内进行,有较大的局限性。五四运动后,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逐渐认识到,马克思主义若在中国深深扎根,离不开工人阶级的力量,只凭知识分子的活动是不能改造中国的,只有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才有可能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因此,以李大钊为首的一批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宣传。他们主要采取了三种方式向工人灌输马克思主义思想。

(一)以纪念五一劳动节为契机,扩大马克思主义在工人中的宣传

李大钊很早就认识到深入工人中进行马克思主义宣传的必要性。在李大钊的号召和影响下,进步青年喊出“到民间去”的口号。北京大学的进步学生首先行动起来。邓中夏等北大学生组织了“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开辟了

长辛店这个早期北方工人运动的重要据点。

五四时期,李大钊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许多地区都进行了纪念五一劳动节的集会活动。在1920年五一劳动节这天,李大钊参与主持了北京大学召开的五一劳动节纪念会。他还发表了文章,指出“五一运动”应当是“劳工阶级的运动”,而不应“只是三五文人的运动”,号召知识分子不要光空喊“劳工神圣”的口号,而要实际地到“劳工”中发动群众^{[2]245}。这年5月1日,北京《晨报》副刊出版了一个《劳动节纪念专号》,《新青年》《星期评论》《新社会》《晨报》和《北京大学学生周刊》也都出版了《劳动节纪念专号》。《新青年》的纪念专号(即第7卷第6号)共约400页,超过通常页数的一倍以上,刊登了各类文章20多篇,首次刊载了上海、北京、天津等十几个城市工人现状的调查报告,并附图片32张。该专号不仅有孙中山、蔡元培等知名人士的题词,而且还刊印了12位工人的亲笔题词。《新青年》为工人开辟讲坛,直接反映工人的心声,在知识分子与工人结合的道路上迈出了可贵的一步。一些具有初步共产主义觉悟的知识分子,通过组织工人集会、向民众演讲、写文章,实际上已进行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结合的初步尝试。

(二)通过办《新青年》《每周评论》和工人刊物,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

五四运动前,只有《新青年》《每周评论》等少数几种进步刊物宣传过马克思主义。五四运动后在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积极推动下,各地新报刊增多,发表的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也迅速增多,掀起了马克思主义传播高潮。上海的《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北京的《晨报》副刊以及《京报》《中华新报》《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等都刊登了讨论马克思主义与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文章,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著作的译文。在五四时期的众多报刊杂志中,影响最大的无疑属《新青年》,它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从第8卷第1号始《新青年》开辟“俄罗斯研究专栏”,登载列宁著作、苏俄革命以及国际共运方面的情

况。此后,《新青年》的主旨转向研究、宣传马列理论,讨论建党思想和党的纲领^①。

为了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李大钊等人还创办了《劳动音》《工人周刊》等面向工人的刊物。这些刊物以工人为宣传对象,内容生动丰富,版式活泼,深入浅出地向工人传播革命道理。这些刊物还十分重视发表工人的文章,呼吁工人将自己要说的话投稿到杂志社来。1920年11月7日李大钊等人在北京创办了《劳动音》周刊,1921年又创办了《工人周刊》。这两个刊物都很注重用具体事实和典型事件反映工人的悲惨生活,以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被誉为“北方劳动界的言论机关”。《工人周刊》后来成为中共北方区委的党报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的机关报。该刊物辟有评论、劳动新潮、调查、特载、工人常识、工人之声等栏目,报道各地工人受压迫的遭遇,刊登工人反抗压迫、要求改善经济状况的罢工斗争。《工人周刊》对陇海铁路工人罢工、香港海员罢工、开滦煤矿工人大罢工、京汉铁路工人罢工及二七惨案等都作过报道和声援,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

(三)建立工人夜校和工会,有组织地对工人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

1921年元旦创办的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创办的第一所工人学校。入学者全是工人及其子弟,由邓中夏主持校务,杨人杞、朱务善、罗章龙、吴雨铭等轮流讲课。办学经费主要由北大学生会和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捐助,李大钊是主要捐助者之一。该校“以增进‘劳动者’和‘劳动者的子弟’完全知识、养成‘劳动者’和‘劳动者的子弟’高尚人格为宗旨”^②。学校备有《劳动音》周刊、《共产党》月刊、《工人周刊》等刊物。进步学生住在劳动学校,与工人生活在一起,共同学习、共同劳动。不久北京共产主义又成立了长辛店工人俱乐

部。此外,上海等共产主义小组也办了工人补习学校。各地的马克思主义者通过办工人夜校的方式,逐渐地将马克思主义思想灌输到工人群众中去,有效地提高了工人阶级的觉悟,培养了骨干,奠定了建立工会和领导工人运动的基础。这表明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逐渐地由自在的阶级向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自为阶级转变。

三、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建立新型社团和政党组织的发端

五四运动后几年间中国出现了许多新建社团。这些社团一般维持时间不长,其政治倾向大致可分三类:一类是以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为主的社团;一类是以宣传反封建的民主主义、社会改良主义为主,但同时也介绍一些社会主义思想和流派的社团;一类是以宣传西方其他社会主义流派和无政府主义为主的社团。这些社团组织中,最早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建立的具有代表性的新型社团是李大钊指导下成立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五四运动后,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队伍日益壮大,一些新的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社团在全国各地纷纷成立。当时,对传播马克思主义影响最大的社团是“北京大学马克思(即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该会1920年3月在李大钊倡导下成立,发起时有邓中夏、罗章龙、黄日葵、高尚德、刘仁静、何孟雄等19人,皆是北大学生。后来发展到包括唐山、郑州等地工人在内的二三百人。他们拟定的规约有六条,其中最主要的三条是:“一、本会叫做‘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以研究关于马克思派的著述为目的。二、对于马克思派学说研究有兴味的和愿意研究马氏学说的人,都可以做本会底会员。入会手续,由会员介绍或自己请愿,但须经会中认可。三、研究的方法分四项:搜集马氏学说底德、英、法、

^① 1923年6月,《新青年》改为季刊,由刚从俄国回来的瞿秋白主编,着重探讨和宣传中共的民主革命纲领及马列主义理论,成为中共中央的理论刊物。

^② 张国焘的《长辛店工人发起劳动补习学校》,见《劳动者》第15册,1920年11月21日。

日、中文各种图书;讨论会;讲演会;编译、刊印《马克思全集》和其他有关的论文。”^①为了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该会还成立了一个翻译室,下设英文、德文、法文三个翻译组,他们译过《共产党宣言》的德文本,在李大钊号召下译过《资本论》第一卷等原著。该会会员还集资建立了一个名为“亢慕尼斋”(英文“共产主义”音译)的图书室。通过会员个人捐赠书款、分派会员外出采买等办法,积极搜集马克思主义原著和有关的书刊。1922年初,据该会第四号通告称:“本会现已有英文书籍40余种,中文书籍20余种。”该会还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列出了一张社会主义丛书书单。

社会主义丛书

Communist Manifesto(Marx and Engels)
Socialism, Utopian and Scientific(Engels)
Ethics and Materialistic Conception of History(Kautsky)
Essays on the Materialistic Conception of History(Labriola)
Socialism and Philosophy(Labriola)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Karl Marx(Bondon)
The Books on Socialist Philosophy(Engels)
Some of the Philosophica Essays of Joseph Dietzgen
The Poverty of Philosophy(Marx)
Anarchism and Socialism(Plechanoff)
The Origin of Family(Engels)
Bolshevik Theory(Postgate)
The Infantile Sickness of 《Leftism》 in Communism(Lenin)
The Proletarian Revolution(Lenin)
The Collapse of Capitalism(Hermanin Cahn)
Militarism(Liebknecht)
Two Pages From Roman History(Daniel

De Leon)

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
阶级斗争(恽代英译)
马格斯资本论入门(李汉俊译)
马克思经济学说(李达译)
社会主义史(李季译)
社会问题详解(李季译)
社会问题概论(周佛海译)
到自由之路(雁冰、凌霜、崧年共译)
工团主义(李季译)
共产党底计划、政治理想、社会结构学(大柳译)^②

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还一面举办定期演讲会、举办一些纪念活动,进行马克思主义宣传,一面参加实际革命斗争、声援工人运动,努力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影响。该组织一定程度上为北京地区最早的共产党组织的建立做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从东(日本)、西(欧洲)、北(俄国)三个不同渠道传入,中国思想界终于发生了质变。一批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开始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武器分析中国社会实际问题,指导中国社会改造的实践活动,促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肇始和发展。他们开始探讨在中国特殊环境下建党的基本思想,通过办工人刊物、办工人夜校、组织工会、组织集会演讲等方式把科学的理论灌输于工人之中,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找到了它的物质基础。于是,产生了精神变物质的历史性飞跃,中国新型政党组织便应运而生了。

继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之后,1920年10月,李大钊在北京发起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该小组的最早成员有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等人。该小组的活动地点就在李大钊家里和他的办公室,小组的活动经费为他每月捐出的八十元工资。他们一边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一

① 见《发起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启事》,《北京大学日刊》,1921年11月17日。

② 见《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通告》(四),《北京大学日刊》,1922年2月6日。

边开展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同年 12 月,李大钊主持召开会议,决定成立“共产党北京支部”,由李大钊担任书记。到中共一大召开前,北京小组成员已经有李大钊、邓中夏、张申府、罗章龙、高君宇、何孟雄、缪伯英、张国焘、张太雷、刘仁静等十多人,成为最早组成中国共产党的八个共产主义组织之一^[5]。

在李大钊和陈独秀的教导和影响下,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一批爱国青年知识分子五四运动后成为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注入了新的活力,对中国社会改造问题进行了新的思考和探索。他们使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和中国革命的向前发展有了相应的组织基础、干部保证和思想准备。他们在五四运动后不长时间就已经用科学理论分析中国社会实际问题,在相当程度上抓住了构成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基本特征的一些主要环节。尽管这些认识还不系统,结论也不完全正确,但他们已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开始了可贵的探索。

1920 年 3 月,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来华,李大钊与维经斯基进行了深入交谈,对筹建中国新型政党组织达成一致意见。此时李大钊已感到在中国仅建立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团体,已不能满足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他明确提出:中国“要急急组织一个团体。这个团体不是政客组织的政党,也不是中产阶级的民主党,乃是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当年夏,陈独秀筹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时就新型政党的名称征求李大钊的意见,李大钊回信表示叫共产党。

1921 年 6 月初,共产国际派来马林和尼克尔斯基来华帮助建立共产党,他们先到北京大学与李大钊会面,进一步就成立全国性政党、召开全国党的代表大会问题交换意见,然后他们赴上海与陈独秀、李达、李汉俊等人筹备中共一大。中国共产党正式建立前,北方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大都是在李大钊的指导与帮助下建立起来的。1920 年李大钊曾派陈为人到济南,与王尽美和邓恩铭等人商议筹建共产党组织^[6];派张太雷到天津,建立了天津的第一个团小组;派

高君宇到山西筹建社会主义青年团。这些建党之举,扩大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组织基础。

中国共产党创建的一个特点是思想建党先于组织建党。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肇始于十月革命后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最早系统研究和用这一理论对中国问题的思考。“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李大钊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运动相结合的伟大进程中的肇始之功彪炳史册。“一部中国共产党党史,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发展过程,就是在实践中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的过程。”^[7]回溯中国共产党近百年奋斗史,最早系统研究和传播了马克思主义、最早用马克思主义分析解决中国社会问题、最早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最早建立了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团体的皆是李大钊先生。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上,他无疑是一个伟大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中国共产党诞生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从此,成为了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强大思想武器。

参考文献:

- [1] 李大钊. 李大钊全集:第 2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 [2] 李大钊. 李大钊全集:第 3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 [3] 李大钊. 李大钊全集:第 4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165.
- [4] 金冲及. 周恩来传:第 1 卷[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60.
- [5] 董宝瑞. 李大钊评传[M]. 秦皇岛:燕山大学出版社,2017:358-359.
- [6] 朱文通. 李大钊年谱长编[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322.
- [7] 石仲泉. 中共党史视域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几个问题[J]. 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16(4):5.

(责任编辑:李亚平)